

吴于廑先生与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

齐世荣

我国世界史学科的建立,严格说来是在1949年以后。此前,各大学历史系的外国史课程主要是西洋史(即欧美史),包括西洋通史、西洋断代史和一些欧美国家的国别史。开设东洋史(如日本史、印度史等)课程的学校很少。似乎没有一所大学的历史系专门开设过非洲史和拉丁美洲史。总之,那时还没有世界史。中学的外国史内容主要也是讲西洋史。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旧中国的执政者和知识上层崇拜欧美,以欧美为榜样,西洋史自然便占有中心地位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屹立于亚洲的东方大国,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不能再像旧中国统治者那样只把目光集中于欧美列强,必须放眼世界,既要了解它的现状,还要追溯它的历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世界史学科终于一步步建立起来,并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各大专院校一般设有世界史课程,分做四大段(上古、中古、近代、现代)讲授,此外还有一些区域史、国别史、专题史等等。中学也设置了世界史课程。从1949年到1959年,各高等院校的世界史课程大都采用苏联教材,那时把苏联史学看得很重,中国教授们即便在某些方面有不同看法,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不敢也不可能发表。1959年中苏关系破裂,此后“言必称苏联史学”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1962年,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世界史学者首次编写的世界通史类著作,代表了当时中国世界史研究所达到的水平,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这部书加强了亚非拉部分的内容,增加了中国与外国文化交流的章节,比苏联教材有所改进,但整个框架仍未脱苏联教材窠臼。

改革开放以后,政治环境改善了,学者们既敢于打破苏联世界史的框框,也敢于参考西方学者的看法了,于是人们热烈议论起世界史究竟应当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以及世界史如何编写的问题。吴于廑先生从1978年起大力投入世界史学科的建设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以下从4个方面试做一些介绍。

一、什么是世界史学科

吴先生给世界史下了一个定义:“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为全世界成一密切联系整体的过程进行系统探讨和阐述。”^①他多次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的一句话:“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他还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另一句话:“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②用以说明他给世界史学科所下定义的根据。

吴先生还进一步指出,世界史的概念不应庞杂,它不是囊括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的一口大麻袋。“就世界史作为历史学中一门单独的分支学科而言,它的探索目标必然要求从多方面涉及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历史,但它不是一门中国域外史,也不是包括一切国家、地区历史的总汇。”^③实际上,要把一切国家、地区的历史都写在一起,不仅在篇幅上要无限扩大(而这是做不到的),更重要的是这样写出来的世界历史让读者根本无法看清楚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和它的全貌,只能见一棵一棵的树木,而不见森林。

吴先生强调指出世界历史的宏观性。他说:“世界史是宏观历史。宏观历史的特点之一就是视野要比较广阔,把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内容加以提炼、综合、比较,相同的地方看到它是一,有特殊的地方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页。

③吴于廑:《世界史学科前景杂说》,见《吴于廑学术论著自选集》(以下简称《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2页。

看到它是多,做到一和多的统一,来阐明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阐明各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潮。世界史要勾划的,是长卷的江山万里图,而非团团宫扇上的工笔花鸟。国别史、地区史、专史的精密研究成果,必须要理解、吸收,而且不足的还要作认真的补充研究。但是必须超越国别史和地区史,绝不是把国别史、地区史以一定的结构汇编在一起就是世界史了。”^①

二、世界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

有些人对吴先生给世界史学科所下的定义发生了一种误解,以为他只强调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吴先生对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有十分全面的论述。他说:“在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漫长过程中,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并不是平行的、各自独立的。它们互为条件,最初是缓慢地、后来是越来越急速地促成历史由分散的发展到以世界为一整体的发展。”“纵向发展制约着横向发展。纵向发展所达到的阶段和水平,规定着横向发展的规模和广度。”“横向发展一方面受纵向发展的制约,一方面又对纵向发展具有反作用。横向发展与一定阶段的纵向发展相适应,就往往能促进和深化纵向发展。”他特别指出“在历史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横向发展对纵向发展的反作用表现得尤其明显。”吴先生的结论是:“历史的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方面。它们共同的基础和最终的推动力量是物质生产的进步。”^②今天,西方的全球史学者十分重视世界历史的横向发展,对人类跨文化互动的历史做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但他们比较忽视历史的纵向发展,是一个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使了工业的扩展”^③。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说:它(指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④。这些话说明了纵向发展和横向发展的相互作用,不应只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

三、世界历史的专题研究

吴先生认为,在世界史这门学科中,有不少重要的超出地区史、国别史范围的专门课题,有待研究。不研究这样的课题,就难以从全局来考察世界历史。他举例说,“一种是对某一特定时期不同地区的历史进行综合比较研究,考察这个时期世界历史的全局发展。”另一类是关于特定地区和世界历史全局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再一类是有些重大的历史运动,许多国家或地区都曾经经历过,从世界全局对这类共同现象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必然有利于阐明一个时期的世界历史的潮流^⑤。吴先生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专题研究的重要性,而且自己也就若干重要专题撰写了论文,例如《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世界历史上的农本与重商》、《历史上农耕世界对工业世界的孕育》、《亚欧大陆传统农耕世界不同国家在新兴工业世界冲击下的反映》^⑥。这四篇论文说明了人类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这一悠久行程中的诸大历史运动,材料丰富,分析深刻,堪称鸿篇巨制。

四、对世界史分期的重要看法

吴先生对世界史分期有独到的见解。他反对“剑桥三史”(即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上古史》、《剑桥中古史》、《剑桥近代史》)关于上古、中古、近代三个时期的划分标志,写道:“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上古史就完了,中古史就开始了。1453年,15世纪中叶,土耳其人打下了君士坦丁堡,西方正当文艺复兴,中古史就完了,近代史就开始了。这种分期的标志,很清楚是欧洲历史分期的标志”,是“欧洲中心

①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见《自选集》,第28页。

②吴于廑:《世界历史一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作》,见《自选集》,第61~66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4页。

⑤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见《自选集》,第25页~28页。

⑥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见《自选集》,第91页~225页。

论在分期问题上的表现”。他认为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多卷本《世界通史》按社会形态划分世界历史的各个时期在原则上是对的,但其具体的划分方法“实际上是自十六世纪以来西方传统的三分法再加一头一尾,头是原始社会,尾是1917年以后社会主义时代的开始”,仍然保留着西方资产阶级史学以欧洲历史分期决定世界历史分期的浓厚色彩^①。

吴于廑先生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把古代史作为一编,而不是像过去周、吴本那样把古代史、中古史明确地各自划分为一卷。他认为,“前资本主义的两个阶级社会,即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都难以某一地区历史实例作为典型,也很难以某一实例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作为世界历史上划分两个社会形态的标准。而且,古代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劳动者,与中古时代的封建依附农民往往不易分清界限。”“不仅依附劳动者是这样,将分别存在于古代世界和中古时代的自由劳动者作相互对照,其情况也是这样。”^②他还说,采取统一的超越地区差别的划分界限,把早于此限的纳入奴隶制,晚于此限的纳入封建制,是不妥的。除少数如西方古典奴隶制的一些中心而外,这种划限的方式很难说明前于此限的依附劳动者和自由劳动者怎样一越此限,就成为后于此限的依附农民和自由农民。总之,在世界历史上区分奴隶制社会与封建制社会确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必须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雷海宗先生在《世界上古史讲义》中写道:“就今日所已知的来讲,我们暂时可以说,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的差别,还不如氏族社会与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差别那样巨大,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多有交错,各地情况也都歧异,整个的问题仍待历史学者彻底的分析研究。”^③雷、吴两位的看法有某种相同之处。

六卷本《世界史》的《近代史》编以1500年为起点。吴先生认为:“十五、十六世纪是历史发展为世界历史的重大转折时期。转折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在亚欧大陆农耕世界的内部,首先在西欧,社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根本变化。人类历史的前资本主义时期因这个变化而归于结束,资本主义开始以其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在历史的地平线上。”^④有人认为,这仍然是欧洲中心论的一种反映。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吴先生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立论的,并非故意夸大欧洲的作用。我们批判“欧洲中心论”,只是反对用欧洲的价值观念衡量一切,反对那种认为只有欧洲历史才具有推动全人类进步的意义的观点,但并不抹杀自工业革命以来欧洲在世界历史上曾经占有的优先地位和起过的重要作用。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在一个时期里,某个国家或某几个国家走在前面,对周边地区产生较大的影响,于是便成为“中心”。“中心”有时是一个,有时不止一个,而且“中心”不是一成不变的。例如,8世纪中期以后约一百年,阿拉伯帝国臻于极盛,与此同时正值中国隋唐时代,它们在东西方各自占有“中心”的地位。19世纪是欧洲力量的鼎盛时期,西欧自然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中心”。还有一种情况,即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某一部门在一定时间内成为世界的中心。马克思说:“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⑤

吴先生十分重视研究十五、十六世纪的历史,为此在武汉大学成立了一个“十五、十六世纪世界史研究室”,并主持出版了《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三编,刊载了几十篇颇有价值的论文。

总之,吴于廑先生对于建立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从理论到体系到具体内容都发表了深刻的、有启发性的见解。当然,他所做的工作基本是开拓性的,他提出了问题,指出了方向,但要达到目的地,还要走很远很远的路,这是需要后继者用几代时间去实现的。他在《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前言中说:“我们研究室在近两三年所做的点滴工作,仅仅是借光于他人工作的一些有关的研究,为自己探路。这所借的光,也只是我们目前所能接触到的那一星半点,微弱而又不集中,因之

① 吴于廑:《关于编纂世界史的意见》,见《自选集》,第19页~22页。

② 吴于廑:《世界历史》,见《自选集》,第69页~70页。

③ 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第605页。

④ 吴于廑:《世界历史》,见《自选集》,第77页。

⑤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263页。

所探的路也就很狭窄、很有限,只是某一方面的某些问题,说不上宽广,更说不上在宽广的范围里为比较重要的问题理清眉目。这本集子是一小册真正意义的初学集。”他还说:“这本初学集只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开始。发表这本初学集,并不是我们已经得到什么可以自信的结论,而是把我们的设想,把我们试图为之努力的研究方向,通过对一些具体问题的探索,提出来就正于读者。”^①这些话体现了一个严肃学者的谦虚精神,但也是实事求是的。

世界史学科目前还处在它的幼年时期。由于这门学科的内容异常丰富,异常复杂,要使它成熟起来,还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个任务就历史地落在了今天中青年学者的身上。他们未来的成就一定也应当超过前人,但先驱者的筚路蓝缕之功是永远值得纪念的。

纪念中国世界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

朱 寰

今年是中国世界史学大师吴于廑先生诞辰 100 周年纪念。由于两部《世界史》编纂工作的关系,我曾与先生相处多年。先生的大师风范,始终活在我们的心里。先生道德高尚,学识渊博,永远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我终生难忘与先生紧密相处的日日月月。我虽没有那么幸运,投身于先生门下,但几十年来一直视先生为自己的恩师。先生的指导和教诲,受益匪浅,惠及终生。先生之德,高山仰止;先生之教,化雨春风。

回想起来,吴先生的大名早为学界所景仰。20 世纪 50 年代,郭守田先生在世界史的一次会议上说,解放前我国公费派遣出国留学,多半都是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中国的哈佛大学留学生中历史学方面有‘前三杰’和‘后三杰’:20 年代的前三杰是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40 年代的后三杰是吴于廑、杨联陞和任华。”我想这些学术名人,只能慕名而不能谋面,实属憾事。

说也凑巧,党中央宣传部为了总结建国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高校教材建设的经验和成就,决定组织全国力量重新编写高校教材。国家教育部指定北京大学周一良教授、武汉大学吴于廑教授为《世界通史》总主编,另由各大学抽调一部分编者在周、吴二位主编领导下参加编纂工作。我有幸参加了这部教材中古分册的编纂工作,从而在 1960—1961 年间,有机会与吴于廑先生直接接触,有问题当面请教,聆听先生的亲切教诲。这两年我切身感到受益良多。

首先,我想谈谈对吴先生世界史观的理解。旧中国在历史学科中没有世界史,除中国史之外,只有英国史、美国史、法国史、日本史等国别史,或是东洋史、西洋史等地区史,或是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门史。大学里根本不开世界史课。新中国建国后,各大学基本上都开设了《世界史》课。究竟什么是世界史?当时许多人弄不清楚。教《世界史》的教师都希望能有一个科学的认识。特别是在编写《世界通史》时,更需要解决这个问题。1960 年夏《世界通史》编写组在北京饭店召集国内数十名专家学者,讨论《世界史》教材大纲和教材初稿。会上关于世界史的定义就有很大分歧。有的说:“《世界史》就是本国史以外的其它国家的历史”;有的说:“《世界史》就是各地区史的综合,各大洲的历史加到一起,就是整个世界史”。这些意见是否正确,一时难以判断,但似乎没有反映世界史问题的本质。会后我去察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想知道马克思主义对世界史问题的基本观点。结果查到了几条:其中有一条,感到难以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②。马克思这句话理论深奥,需要认真研究!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那么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存在?而世界史又是结果,是什么结果?我总是想不太明白,对世界史的本质认识不清。

^①《自选集》,第 543~546 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 页。